

## 歷史學與區域研究： 以東臺灣地區的研究為例\*

林玉茹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助研究員

### 摘 要

本文基本上是從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之間的關係著眼，分別反省歷史學的區域研究傳統、臺灣歷史學界對區域史研究的看法、臺灣史的區域史研究發展脈絡。最後，並以東臺灣地區為例，檢討戰後以來東部區域史研究的成果和發展趨勢。

二十世紀以來較具區域史傾向的理論或學派有法國年鑑學派、施堅雅的巨區理論、一九七〇年代美國中國史的反省以及一九八〇年代日本明清史學者提出的地域社會論。但是，除了年鑑學派之外，歷史學者選擇一個地區或區域作為研究，基本上更關心區域差異問題或是其社會樣貌。

臺灣歷史學界有意識地主張區域史研究，以一九七〇年代初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推行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為嚆矢，並首度進行區域史研究方法論的反省。反觀，受到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臺灣史研究一開始即以「中國地方史」的面貌出現，遑論臺灣區域史之研究。

直至一九七〇年代後期，臺灣史研究萌芽與發展階段，區域史研究才正式展開，但是基本上是以漢人中心史觀出發的清代臺灣開發史研究。一九九〇年代受到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影響，地域主義逐漸興起，各地方誌的編修乃促使臺灣區域史研究乃蔚為風氣。東臺灣區域史的發展脈絡，亦復如此。東臺灣研究在一九九〇年之前，基本上是以東部人研究東部地方史的格局下展開，一九九〇年代中葉東臺灣研究會成立和臺東縣史的編纂，促使東部研究趨於活絡。特別是東臺灣研究會嘗試營造的區域研究典範，或許是面臨瓶頸的臺灣區域史研究可以突破的方法之一。

**關鍵詞：** 區域研究 歷史學 臺灣史 區域史 東臺灣研究 東臺灣研究會

---

\* 本文曾於 2002 年 6 月 27 日東臺灣研究會舉辦的「區域研究與學科發展」討論會中宣讀。又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指正，謹此致謝。

## 一、前 言

歷史學的區域史傳統自古以來即有，方志、鄉土志即為典型。然而，跳脫僅是以地理區作為描述範圍或重點的地理志、地方誌之傳統框架，從學術研究觀點反省區域史、區域研究的內涵或意義，卻很晚才出現。究竟歷史學的區域研究是什麼？區域研究的定義和元素是什麼？區域研究在歷史學研究中，可以產生何種貢獻和啟發？區域研究可能產生的問題是什麼？這些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臺灣歷史學界早於一九七〇年代，已經開始反省區域史研究的可能性，並同時嘗試提出大型的共同計畫，進行中國和臺灣地區的區域史研究。臺灣史則一出現，即被定義成區域史，成為「中國地方史」的一環。然而，隨著一九八〇年代政治環境和氣氛的改變，長期受到政治因素掣肘的臺灣史研究，逐漸成為臺灣歷史學界研究的重點，臺灣區域史的研究遂漸受注意。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地域史研究漸漸成為臺灣史研究的主流之一，卻不免出現了一些問題。究竟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之間，應該如何取得平衡或調和，兩者可以存在何種對話機制，也許是必須深思的。

本文基本上是從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之間的關係著眼，首先反省歷史學的區域研究傳統，臺灣歷史學界對區域史研究的看法，再討論臺灣史的區域史研究方向和發展。最後，則以東臺灣地區為例，檢討戰後以來東部區域史研究的成果和發展方向。

## 二、歷史學的區域史研究傳統

歷史學自古以來即是一門龐大的學問，要全面去檢討古今中外歷史學的發展，誠然不是本文所能企及的，也非本文之重點。因此，本節僅就二十世紀以來，較具有區域史研究傾向的幾個重要理論或學派的觀點，作一個簡單的討論。這些理論或觀點，大概包括法國年鑑學派、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巨區理論、一九七〇年代以降美國中國史

學者的反省、一九八〇年代日本明清史學者提出的地域社會論。以下略述之。

### (一) 法國年鑑學派

法國年鑑學派最早關心地域與歷史之間關係的是第一代的費夫賀 (Lucien Febvre)。他於一九二二年出版《土地與人的演進》一書，首次強調歷史學與地理學的關係。<sup>1</sup>第二代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於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六六年增訂再版的《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則開啓了另一個新視野。雖然，布勞岱自稱區域史學並非他所謂「整體性歷史空間」的旨趣所在，<sup>2</sup>但是他充分受到地理學的影響，甚至某種程度相信地理決定論。他主張歷史學家必須優先考慮空間因素，並嘗試定義出「地理的歷史」。因此，地中海世界一書的主角不是傳統歷史學關懷的政治人物菲力普二世，而是「地中海」這個空間。<sup>3</sup>布勞岱自稱自己深受地中海所吸引，<sup>4</sup>研究取向很明顯地更關懷地區，而擺脫以人物或國家為主題的傳統取徑，改以地中海本身做為論述的主體。<sup>5</sup>這種以地理空間為出發點的研究取向，對於歷史學的區域研究毋寧是具有啟發性的。

年鑑學派第三代的勒華拉杜裏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在法國農村的研究，特別是一九七五年著名的《蒙大猶》(Montaillou)，受到人類學民族誌的影響，更傾向於微觀的小區域史研究。他結合「環境史」、「人口史」、「序列史」及「心態史」，採取區域整體歷史的研究取向，<sup>6</sup>更關心人類社會的基本細胞。勒華拉杜裏與布勞岱的研究取向並不相

---

<sup>1</sup> 「史學一生：布勞代爾訪問錄」，收於賴建誠譯，《年鑑學派管窺》(臺北：麥田，1996)，頁 155。

<sup>2</sup> 張隆志，〈期待臺灣研究與年鑑史學的嶄新對話〉，《東臺灣研究》2 期 (1997 年 12 月)，頁 63。

<sup>3</sup> 賴建誠譯，《年鑑學派管窺》第一冊，頁 70、154。

<sup>4</sup> 賴建誠譯，《年鑑學派管窺》第一冊，頁 154。

<sup>5</sup> 張隆志，〈期待臺灣研究與年鑑史學的嶄新對話〉，頁 57。

<sup>6</sup> 張隆志，〈期待臺灣研究與年鑑史學的嶄新對話〉，頁 63。

同，地區並非他的重點，他更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係。<sup>7</sup>不過，村落史或社區史研究，仍在勒華拉杜裏的研究中獲得啓示。<sup>8</sup>

## （二）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巨區理論<sup>9</sup>

美國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和歷史學家施堅雅，也是受到地理學影響甚深的研究者。他於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首先發表〈鄉村中國的市場體系與社會結構〉，<sup>10</sup>重建中國鄉村的市場體系，探討市場結構的社會經濟意義和變遷，首次強調地區的界限與地區體系文化的特色。<sup>11</sup>一九七七年施氏出版《帝國晚期的中國城市》一書，認為十九世紀中國並未形成全國一體化的城市體系，而將中國分成九大巨區。<sup>12</sup>施堅雅的區域體系研究法（regional system approach）是將注意力轉向廣大中國的內部差異，以區域研究來界定十九世紀中國都市化範圍，並透過都市體系的整合程度觀察中國現代化狀況。他認為區域體系分析，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動態的。不同區域由於地理環境和天然資源的差異，使得發生於自然

---

<sup>7</sup> 參見周樑楷，〈年鑑學派的史學傳統及其轉變〉，收於氏著《近代歐洲史學及史學思想》（臺北：華世，1985），頁 220-221。

<sup>8</sup> 盧建榮，〈滴水測海：豎立由口供治史的新典範〉，收於許明龍譯，埃曼紐·勒華拉杜裏著，《蒙大猶》（臺北：麥田，2001），頁 x。

<sup>9</sup> 臺灣有關施堅雅巨區理論的介紹相當多，最早的是張秋寶，〈中地理論的發展與中國之研究〉，《思與言》13：1（1975年），頁 37-45、陳文德，〈史堅納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人類與文化》18期（1983年），頁 56-64、溫振華，〈施堅雅的中國市鎮研究介紹〉，《教學與研究》3期（1978年9月），頁 155-184。由此可見，其理論對於臺灣學術研究啟發之深刻。

<sup>10</sup> G.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II. I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1964): 3-43; 24 (2) (1965): 195-228; 24 (3) (1965): 363-399。

<sup>11</sup> 張秋寶，〈中地理論的發展與中國之研究〉，頁 42；陳文德，〈史堅納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頁 59。

<sup>12</sup> G.W.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李洵、趙毅〈施堅雅教授中國城市史研究評介〉，收於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頁 5-6。

界和歷史上的事件對於各區域有不同的影響。<sup>13</sup>儘管施氏理論，受到不少批評，但是他所開啓的區域分析體系模式，卻對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者有相當大的衝擊。

### （三）一九七〇年代美國中國史學界「以中國為中心」取徑

自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美國學界受到越戰反戰運動形成的反帝國主義和自我反省的影響，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相當深刻的反省。<sup>14</sup>其中一個新的方向，即是擺脫過去「衝擊與反應」、「現代化」及「帝國主義論」的外在力量影響陰影，轉而重視內在因素，強調以中國作為中國史中心的研究取向。這種研究取徑，主張將中國問題置於中國本身的脈絡中，避免西方觀點的偏見。其次，認為中國包含廣泛的區域和地方差異，因此將中國橫向地劃分為不同的區域、省或地方。此種新研究觀點之出現，不但使區域性和地方性的歷史研究成為可能，更提倡運用其他學科的新理論和新方法到歷史分析中。<sup>15</sup>區域史的研究觀點，乃自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成為中國史和世界史的主要研究趨勢。<sup>16</sup>

---

<sup>13</sup> Paul A. Cohen (柯保安) 著，李榮泰等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臺北：聯經，1991)，頁 191-193。

<sup>14</sup> Paul A. Cohen (柯保安) 著，李榮泰等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頁 214-215。一九七〇年代末則有Ramon H. Myers (馬若孟) 和T.A. Metzger (墨子刻) 著，劉紀曜、溫振華譯，〈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上)(下)，《食貨》10卷10期(1981年1月)，頁 28-41；10卷11期(1981年3月)，頁 37-51。

<sup>15</sup> Paul A. Cohen (柯保安) 著，李榮泰等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頁 x vii、182-189。

<sup>16</sup> 同上註，頁 214；Ramon H. Myers (馬若孟) 和T. A. Metzger (墨子刻) 著，劉紀曜、溫振華譯，〈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上)，頁 451；

#### (四) 日本明清史學界的地域社會論。

日本的地域史研究，早自一九二〇年代，因天皇制國家提倡結合忠誠和鄉土愛的鄉土研究，官方隨之編輯鄉土史和地方史，以及柳田國男等人對鄉土研究的討論，已經隱然成形。至一九三〇年代，地方史研究更盛極一時。<sup>17</sup>戰後爲了編修各地方誌，以行政轄區爲界的各種地域性刊物和研究團體紛紛出現。<sup>18</sup>在這種傳統之下，日本學界對於地域史的批判和檢討，乃相當多。

日本的中國史學界，則受到六〇年代、七〇年代美國社會研究的影響，自一九七〇年代亦已著手於地域的多樣性研究。<sup>19</sup>這種研究趨勢與前述著眼於中國的區域差異、施堅雅巨區理論的影響以及著重於社會經濟層面之研究有關。<sup>20</sup>一九八〇年代出現的地域社會論，則試圖從方法論著眼，提出理論模式。

一九八一年，森正夫首度將地域社會的理論系統化，一九八二年並完成「中國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會の視點」一文。<sup>21</sup>此後，地域社會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成爲八〇年代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支配潮流，一直持續到九〇年代。<sup>22</sup>「地域社會」這個名詞的涵義，森正夫認爲有兩種意義，一種是直接對應一定具體地理界限的實體概念，如省、

---

<sup>17</sup> 江村榮一，〈地域史研究小論〉，《神奈川縣史研究》2（1969年1月），頁5。

<sup>18</sup> 例如尼崎市史編修室，一九七一年已經創辦《地域史研究》。

<sup>19</sup> 吳密察，〈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課題：訪濱下武志教授〉，《近代中國史通訊》6（1988年9月），頁113。

<sup>20</sup>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序言」。

<sup>21</sup> 本文相關評論見：東京大學文學部內史學會編，《1982年の歴史學界回顧と展望》，92編第5號，1983年，頁194；檀上寬，〈明清鄉紳論〉，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專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0月），頁476。

<sup>22</sup> 東京大學文學部內史學會編，《1992年の歴史學界回顧と展望》，102編第5號，1993年5月。

府、縣...；另一種是體現某種特定的方法概念，如基層社會、地方社會...等。<sup>23</sup>

一九九八年，山田賢在回顧地域社會論的研究現狀中，又更明確地定義地域社會是一個個體相會，發生社會關係，並進而形成社會關係網絡的場所。而權力、支配、秩序，是讓社會走向一個整體社會的統合磁力。地域社會的場所並未被限制在一個預定空間範圍中，卻是動態的，是從人際關係網絡和共同認知體系中形成的框架。<sup>24</sup>一九九九年地域社會論的健將之一岸本美緒也指出，地域社會論是要擺脫教條式的社會實體化或是必然論，而審視人們活動所交織而成的社會動態，並試圖建立理論模式。<sup>25</sup>

上述各家之外，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以來，濱下武志也強調地域研究的重要性。<sup>26</sup>他的「朝貢貿易體系」理論，則是另一套思維，提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區域經濟體系和「地域圈」的概念。<sup>27</sup>這樣的思考有三個層次，包括西洋對亞洲的關係、亞洲各地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市場層次。<sup>28</sup>濱下雖然認為村落、城鎮的研究有其必要，但強調大區域研究，以區域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主題。<sup>29</sup>

---

<sup>23</sup> 森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會の視點〉，《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 28 號(1982 年)，頁 204-205。

<sup>24</sup> 山田賢著，太城祐子譯，〈中國明清時代「地域社會論」研究的現狀與課題〉，《暨南史學》2 (1999 年 6 月)，頁 42。

<sup>25</sup>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 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序言」。

<sup>26</sup> 一九九七年以降，濱下武志教授有關地域史的討論，有：《地域史とは何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支配の地域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臺北：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0）。

<sup>27</sup>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の國際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體制）とアジア（亞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前言、頁 25-26。王慶成，「序言」，收于朱萌貴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1。

<sup>28</sup> 吳密察，〈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課題：訪濱下武志教授〉，頁 114。

<sup>29</sup> 同上註，頁 113。

整體而言，除了年鑑學派的費夫賀和布勞岱之外，歷史學者選擇一個地區或區域作為研究，基本上更關心區域差異問題或是其社會樣貌。地區只是一個手段，而非關懷所在。歷史學即使在地區史研究中，也更傾向以主題為中心，而非以釐清一地區的特色為重點。

### 三、臺灣歷史學界的區域史研究

一九七〇年代，世界史和中國史走向區域研究的同時，臺灣歷史學界也不落人後。自一九七三年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近史所或近史所）在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下，正式推動區域史研究，著手集體研究計畫「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該計畫自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九年，分省討論中國沿海、沿長江以及內陸等十七個省區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變遷，<sup>30</sup>研究成果則自一九八一年陸續發表。<sup>31</sup>這個計畫的特色有二：一是強調中國區域差異的存在，又因為資料龐雜所致，而以區域作為劃分單位；一是採取科技整合的觀念和方法，進行量化分析，以尋找現代化演進法則，取得整體概念，甚而建立理論。<sup>32</sup>由此看來，該計畫仍然受到美國現代化理論與一九七〇年代以科技整合為

---

<sup>30</sup> 當時分為幾區說法各異，張玉法認為十四省，李國祁說是十區，張朋園認為十七個區域，但第一階段進行沿海沿江十區，第二階段進行內陸七區，預計一九九〇年完成。又本文審查人指出近史所的區域研究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同上，第二階段是利用十個省區的研究成果，綜合或進行政治、社會、經濟等主題研究，第三階段則進行內陸七省區研究。此外，計畫名稱，李國祁說是「中國近代化之區域研究」。見：張玉法，「開幕詞」，收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6），頁1；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2），頁3-4；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收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6），頁849。

<sup>31</sup> 第一本專書是蘇雲峰，《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1）。迄今已出版七個省區的研究成果。

<sup>32</sup>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頁5；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頁856。

主流的區域史研究傳統所影響。雖然此計畫因以省為劃分單位，而備受爭議，卻是臺灣歷史學界有意識地主張區域史研究之濫觴。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副產品之一，是一九八六年八月近史所盛大召開的「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該會議共提出論文二十七篇，分成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兩部分。這次會議的特色，如同張玉法在開幕詞所言，區域的劃分除了自然區和行政省區之外，首度出現文化區的劃分方式。區域研究範圍則由原先沿海、沿江地區，擴張到內陸地區，成為「全國性的區域史」。此外，相當強調區域與區域之間的比較和彼此的關連，並特別注意到帝國主義對區域發展史的影響。<sup>33</sup>

這次會議，從張玉法的開幕詞到該會的綜合討論，包括劉翠溶、Harry Lamley（藍厚理）、蔣永敬、李國祁等四位引言人以及與會學者的發言，在區域史研究的觀點和方法論、優缺點以及其可行性有不少之討論，<sup>34</sup>可以視作臺灣歷史學界對於區域史研究的反省。

就區域史研究的觀點和方法論而言，不少學者直指區域研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必須多注意通則，而非獨特性。區域研究雖然是全面觀察一個地區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變遷，以表現區域的全貌和因果關係，但是最後應綜合分析所有區域，以尋找社會變遷和共同通則。區域研究的內涵雖是時間與空間的組合，卻必須擺脫地方誌格局。區域史並不是主張區域對抗，而是增加區域之間的瞭解。區域研究的分區標準亦被充分討論，劉翠溶主張區域的劃分應該以主題，而非地理區或是行政區，必須是問題導向而非區域導向。施添福也認為必須先有問題，再作分區。

其次，綜合歸納各家所言，區域史的優點至少有四：1.可以與其他學科交流，進行多學科的對話，發展新領域和新議題。2.可以解決資料不足或是資料過於龐大等問題。3.研究者可以採取口述訪問的方式進行研究。4.區域研究可以展現區域之間的差異，進行比較研究。區域史的瓶頸則是：1.所選擇區域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區域的範圍在那裡。

---

<sup>33</sup> 張玉法，「開幕詞」，收於中研院近史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2。

<sup>34</sup> 以下論點，主要整理自中研院近史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下冊，前言、下冊綜合討論、閉幕詞。頁927-941。

2.過份重視區域，而忽略整體。3.區域研究容易造成本位主義。4.田野研究的問題和限制。田野研究只能反映一時一地，進行普遍性論述時，必須注意時空差異。

由一九八六年區域史會議的討論可見，臺灣歷史學者基本上仍將區域視為一種權宜方法，而非主要研究的對象和最終的關懷。主題式的、尋求通則的區域研究被認為是最具有正當性的。儘管如此，臺灣歷史學的區域史研究邁入新里程碑，對於區域史的討論也具有代表性，是區域研究值得反省的。

有別於以中國史為架構的區域研究，一九八〇年代中葉以降，由於東南亞經濟日益發展，臺商在東南亞的大學投資以及一九九三年政府推動「南向政策」等因素之作用，東南亞研究逐漸受到臺灣學界的重視。一九九四年，李遠哲接任中研院院長之後，宣稱十年內中研院將成為臺灣地區研究東南亞問題之重鎮，而推動歷史、考古、語言、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等領域共同組成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sup>35</sup>這個計畫的推出，促使不少歷史學者投身於東南亞研究，<sup>36</sup>成為跨越出中國史中心範疇、另一種類型的區域史研究。<sup>37</sup>

---

<sup>35</sup> 陳三井，〈談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季刊》1卷2期（1996年4月），頁64；陳鴻瑜，〈臺灣的東南亞研究：回顧與展望〉，《東南亞季刊》1卷2期（1996年4月），頁71。

<sup>36</sup> 第一階段的東南亞研究計畫通過十五個分支計畫，其中與歷史有關的有四個，分別是「臺灣總督府在日本南進政策中的角色」、「日本南進政策下臺灣與東南亞的貿易和資源分配」、「日治時期臺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一九五〇年代東南亞華僑在美國東亞外交政策之地位」。（陳三井，〈談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研究〉，頁65）基本上，第一階段的東南亞歷史學研究，顯然偏向以臺灣為中心，探討臺灣與東南亞之間的政策、貿易活動。這種研究取向與濱下武志先生的地域圈概念似乎較為接近。

<sup>37</sup> 一九九九年中研院又增加「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之後更進一步整合成「亞太研究計畫」，並於二〇〇三年提升為「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四、臺灣史的區域研究傾向與發展

戰後臺灣史學界的發展，受到中國新政權之影響，毋寧是以中國史為中心，臺灣史研究則處於尷尬的處境。儘管曾歷經數個不同政權的統治，臺灣史研究僅能依附於中國史，以地方史的面貌來展開。在這種整體臺灣史研究尚有困難的狀況之下，遑論臺灣區域史研究的存在。因此，在說明臺灣史的區域研究傾向之前，本文有必要約略介紹一下戰後以來深受政治環境影響的臺灣史研究脈絡，才能掌握臺灣區域史的研究位置與趨勢。

##### （一）戰後以來臺灣史研究的趨勢<sup>38</sup>

戰後以來臺灣史的研究，根據斷代區分，可以分成史前、早期歷史（包括荷西與明鄭）、清代時期、日治時期以及戰後時期等幾個階段。由其研究的質、量以及時代環境特徵，大概可以分成空洞期、萌發期以及茁壯期等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代中葉，是為空洞期。此期在政治肅殺、白色恐怖的影響之下，較具學術規範的臺灣史研究數量不多，而以史蹟調查、耆老口述記錄為中心，<sup>39</sup>部分作品甚至只是傳抄、剪貼或翻譯日治時期學者的研究成果。研究範圍則以明鄭時期和清代臺灣史為重點，日治時期臺灣史並不多，戰後臺灣史因年代較近、又事涉敏感，更是乏人問津。在時局影響下，研究的課題也以鄭成功研究、民族起義、臺灣漢人武裝抗日運動為焦點，大中國本位主義的意識型態幾乎貫穿所

---

<sup>38</sup> 本段內容參考：林玉茹、李毓中，「國科會人文中心歷史學門研究回顧：臺灣史」（約 182 頁），臺大出版會出版中。

<sup>39</sup> 在一九四五年至五〇年代，因全省通志和縣志編纂之需，由各地文獻會主導地方史資料蒐集，極為熱鬧。另外，包括《臺灣文化》、《臺灣風土》、《民俗臺灣》等等雜誌，試圖發展鄉土研究。不過，畢竟學術性成果有限。有關此時期臺灣史發展狀況，參見：方豪，〈臺灣史的回顧和展望〉，《史蹟勘考》4 期（1976 年 4 月），頁 1-13、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臺大文史叢刊 87，1991），頁 6-9。

有的研究。<sup>40</sup>一九六〇年代之後，雖然出現戴炎輝和曹永和等力作，但是整體而言，學院參與臺灣史研究者仍寥寥可數，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葉才開始出現幾篇清代臺灣史的歷史所碩士論文。

第二階段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至一九八〇年代，稱作萌發期。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開始，學院的臺灣史研究吹起了甦醒的號角，研究成果越來越多。雖然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前，仍以清代臺灣史為研究重點，但是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已經越來越多，<sup>41</sup>甚至逐漸擺脫偏重政治史的桎梏，經濟和社會文化史研究逐漸出現。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學術性的戰後臺灣史研究也加入行列。一九八六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成立，即具有學院有計畫參與臺灣史研究的指標性意義。另一方面，隨著臺灣本土化意識日益升高，過去以大中國本位主義、漢人開發史取向的研究方式受到挑戰，社會學科參與臺灣史研究更多，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課題更為豐富。最重要的是，擺脫了過去方志文獻學研究傳統，而提出臺灣史研究的新議題。<sup>42</sup>本期在土地拓墾史、清代商業貿易史、清代軍事史以及武裝抗日史均有出色的成果，而且迸發精彩的土著化和內地化等觀點之論爭。此外，臺灣史研究的工具書和史料在此期初試啼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之後，過去政治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史料終於解禁出版，意味著臺灣史研究可以脫離政治囿限，邁向新里程碑。

第三階段是一九九〇年代至二〇〇〇年，可稱作茁壯期。此期隨著臺灣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展開，臺灣史研究已經成為所謂的「顯學」。臺灣田野研究室蛻變成為臺灣第一個「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各大學陸續開設臺灣史課程，即是時勢所驅下之

---

<sup>40</sup> 張隆志稱一九八〇年代以前臺灣史研究為「中國地方史研究」。見：《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頁6。

<sup>41</sup> 以各大學碩士論文作為參考座標，在一九八二年以前清代臺灣史佔67.74%，日據16.13%，戰後5.45%。日據臺灣史的研究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開始。李筱峰，〈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大學歷史所中有關臺灣史研究成果之分析〉，《臺灣風物》34卷2期（1984年6月），頁91-92。

<sup>42</sup> 吳密察，〈日本的臺灣史研究：若林正文、吳密察對談〉，《當代》30期（1988年10月），頁26-27。

產物。另一方面，臺灣史研究成果此際大量出現。<sup>43</sup>從早期至戰後臺灣史研究各領域，新研究課題倍增，並出現不少優良的論著，成果更加輝煌。特別是殖民地史研究終於突破戰後以來政治氣氛之囿限，人才輩出，有相當可喜的成績。其次，日治臺灣史和戰後臺灣史研究逐漸取代清代臺灣史成爲研究重心。相對地，清代臺灣史因是過去的研究重點，成果反而漸少，近幾年來學位論文更是偏重戰後臺灣史研究。<sup>44</sup>史料的編纂亦日益盛行，從官方到民間，包括縣市政府、鄉鎮公所以及地方文史工作室均參與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工具書和口述歷史紀錄也在此際大量出現。一九九〇年代也是政治禁忌大解放時期，戰後臺灣史逐漸成爲研究重點是一例，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的研究與史料的編纂，更是盛極一時。

## （二）臺灣區域史研究的發展

早在歷史學者進行區域史研究之前，前述施堅雅中國市場結構一文於一九六五年發表之後，立即引起中國鄉村社會學者的注意。然而，因當時中國尚未開放，無法實地作田野訪查，這些學者乃轉向代表中國文

---

<sup>43</sup> 以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作為比較基礎，在一九八三年以前臺灣史論文佔全臺各大學碩士論文的 5.8%，平均一年一篇，但是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十四年之間，並無一篇。一九七〇年代之後，則平均一年三篇。一九九〇年之前，臺灣史學位論文平均每年有七篇，佔全臺灣碩士論文之 14%。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增為 22%。（李筱峰，〈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大學歷史所中有關臺灣史研究成果之分析〉，頁 88；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1983-199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 期（1994 年 6 月），頁 14。一九九〇年代之後，雖然歷史研究所越設越多，臺灣史論文數量自然增加。不過，一九九〇年代中葉之後，臺灣史論文每年大概有四十篇以上，佔全部三分之一以上，幾乎是一九九〇年之前二倍以上。見：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資料。

<sup>44</sup> 以學位論文作為參考座標，一九九〇年之後，日治時期臺灣史首度超越清代史的研究。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1983-1992）〉，頁 25。

化的臺灣進行調查。最典型的代表是地理學者R.G. Knapp在桃園中壢和人類學家L.W. Crissman在彰化二林的研究。<sup>45</sup>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臺灣學者也於中部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區域研究計畫。一九七一年，中研院院士張光直返臺籌劃和推動「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畫、濁大計劃）。次年七月，在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共同合作之下，正式展開。<sup>46</sup>這次計畫共分成七學科，卻沒有歷史學家參與。這或許是因為戰後以來臺灣歷史學者始終以中國史為中心，而忽視臺灣史研究使然。不過，由於計畫的結構著重於歷史變遷與資料蒐集，<sup>47</sup>不但具有區域史研究的內涵，而且也培養出陳秋坤和林滿紅兩人的臺灣史學位論文。<sup>48</sup>

臺灣區域史研究的正式展開，必須等到前述臺灣史研究的萌芽發展期才開始。一九七八年溫振華和許雪姬的碩士論文是第一本臺灣區域史的學位論文，<sup>49</sup>特別是溫振華碩士論文的架構，成為後來臺灣區域社會

---

<sup>45</sup> 張秋寶，〈中地理論的發展與中國之研究〉，頁42；陳文德，〈史堅納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頁44。

<sup>46</sup> 王崧興，〈濁大流域的民族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36（1973年），頁1；張光直，〈社會人類學與歷史研究：序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收於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1991），頁1。

<sup>47</sup> 參與濁大計劃的七個學科是地形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土壤學、考古學以及民族學。計畫的內容參見：同上註。

<sup>48</sup> 陳秋坤的碩士論文是〈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地區的開發〉（臺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75），林滿紅的碩士論文是〈茶、糖、樟腦與晚清臺灣的經濟社會變遷〉。陳其南，「自序」，《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8-10。

<sup>49</sup> 許倬雲"I-L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民族所集刊》33，1972）討論十九世紀上半葉宜蘭地區的開墾、貿易以及未形成宗族的現象，可稱為臺灣區域史研究之濫觴。不過，許氏並非以治臺灣史為重心，又以英文稿發表，因此並未能引起廣泛注意。直到王世慶〈海山史話〉（《臺北文獻》直字37，1976）、黃克武〈清時板橋的開發與寺廟〉（《臺北文獻》直字45/46，1978）、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師大歷史所碩論，1978）、許雪姬〈明清兩代國人對澎湖群島的認識與防戍〉（臺大歷史所碩論，1978）等論文出現，區域史研究才越來越重要。

經濟史研究之典範。但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到八〇年代中葉，臺灣區域史明顯地是以漢人中心史觀所進行的清代臺灣開發史研究。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隨著臺灣史研究的逐漸加溫，區域史研究不但逐漸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方向，<sup>50</sup>而且展開了跨學科的集體計畫。一九八六年八月，中央研究院在張光直主導之下，推動「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鼓吹跨學科的臺灣史研究。張炎憲、莊英章及施添福等三人，為了「重現濁大計畫精神」，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展開「清代竹塹地區聚落發展與土地租佃關係」研究計劃。<sup>51</sup>竹塹研究之展開，最初顯然是延續濁大計畫模式，基於跨學科、區域整合的研究理念，<sup>52</sup>嘗試集體進行臺灣區域史研究。之後，由於《淡新檔案》、《土地申告書》以及大批土地文書的利用，竹塹地區研究乃逐漸蔚為風潮。新史料的發現，應是促使區域史研究的主要動力之一。另外，一九八〇年代末葉，在臺灣本土化運動逐漸發展的時代環境下，臺灣史，特別是地方史知識的需求日益增加，各地縣市政府文化中心也開始舉辦以地域史為主題的研討會。一九八九年，澎湖縣立文化中心所舉辦的《澎湖開拓史學術研討會》即為嚆矢。

一九九〇年代之後，臺灣本土化運動更為蓬勃，配合地方政府編修方志之需要，從高雄、宜蘭、臺中以及臺東，形成由學者所主導的一波波集體編纂地方史的熱潮，至今未歇。臺灣區域史研究可以說是在編修方志的情況下蔚為風氣，但是意外的收穫則是高雄和宜蘭因此而出現所

---

<sup>50</sup> 以學位論文做為參考座標，一九八〇年代，區域史研究佔 15%，超過政治史、經濟史。研究斷代則仍偏重清代。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1983-1992）〉，頁 26。

<sup>51</sup> 「臺灣田野研究計畫」計畫及其分支計畫，參見《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 期（1986 年 12 月），頁 3-5。施添福，「自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 5。有關這個計劃的內容，參見：張炎憲，〈清代竹塹地區聚落發展與土地租佃關係〉，《臺灣史研究通訊》13 期（1989 年 12 月），頁 9。

<sup>52</sup> 竹塹研究計畫的提出者中，張炎憲是歷史學者，莊英章是人類學者，施添福是地理學者。

謂的「高雄學」和「宜蘭學」論述，每隔幾年即舉辦一次研討會。<sup>53</sup>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地域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更加強調地域認同和地方史研究，「某某學」也成為各地群而仿效的用語。<sup>54</sup>二〇〇〇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分別在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各舉辦一場稱為「北臺灣」、「中臺灣」、「南臺灣」、「東臺灣」的鄉土文化研討會。<sup>55</sup>以地域作為研究單位，儼然已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趨勢。

相對於臺灣區域史的發展模式，反觀東部，一九九四年成立的東臺灣研究會，或許是另類的團體，扮演推動東臺灣研究的重要角色。該會是以科際整合、在地研究、區域研究為號召，集結在地和學院研究者所產生的民間團體。<sup>56</sup>在沒有官方作為財力後盾和指導中心之下，另成一套的運作與發展模式。自一九九六年以來，東臺灣研究會已經多次舉辦各種類型的研討會<sup>57</sup>。該會企圖透過一系列的研討會，逐漸釐清東臺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諸多現象，構築「東臺灣論述」。<sup>58</sup>東臺灣區域史研

---

<sup>53</sup> 高雄研究分成兩組，高雄縣史是一九九一年六月，由中研院民族所林美容所主導，自一九九七年陸續出版「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參見：林美容，〈「高雄縣文獻叢書」編纂緣起〉，收於楊碧川，《高雄縣簡史·人物誌》，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 高雄研究研討會則由陳中和翁文教基金會支援，臺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主導，自一九九四年起舉辦第一屆，至一九九七已經進行四屆。宜蘭縣史由張炎憲所主導，自一九九二年一月成立「宜蘭縣史館籌備處」，並進行「宜蘭縣史系列」纂修，一九九六開始陸續出版宜蘭系列叢書。(張炎憲，「宜蘭縣史序列序」，收於李壬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宜蘭縣政府，1996) 此計畫的副產品是宜蘭縣政府成立縣史館，並舉辦宜蘭研究研討會。一九九五年出版第一屆論文集，目前已進入第四屆，論文集則已經出版三本。

<sup>54</sup> 舉例而言，一九九八年國史館出版《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二千年出現所謂的「雲林學」。

<sup>55</sup> 此計畫事實上是一九九九年由臺灣省文化處所提出，二〇〇〇年臺灣省文化處歸併入文建會，乃改由該會主辦。

<sup>56</sup> 夏黎明，〈發刊辭：一個在地研究構想的提出與實踐〉，《東臺灣研究》創刊號(1996年12月)，頁3。

<sup>57</sup> 有關東臺灣研究會歷年來所舉辦的大小研討會活動沿革，參見：夏黎明，〈「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側記〉，《東臺灣研究》6(2001年12月)，頁213。

<sup>58</sup> 同上註，頁216。

究也在東臺灣研究會的影響下，有些變化。或許「東臺灣研究會」模式，是區域研究可以期待的研究典範之一。

## 五、東臺灣的區域史研究

本節基本上以東臺灣區域史研究為例，針對一九四五年至二〇〇一年之間，東臺灣地區（指涉臺東和花蓮兩縣）的相關歷史研究成果，作形式上的分析，以掌握東臺灣區域史的研究趨勢和問題。至於實際研究內容、觀點以及其成就，則仍待另文作進一步的探討。

戰後以降至二〇〇一年，東臺灣區域史研究的相關期刊論文有六十二篇、碩士論文四篇以及專書七本。（附表一）其中，扣除地方文史工作者和不具學術規範的論文以及學位論文出版的重複計算，<sup>59</sup>大概僅有三十五篇。整體而言，東臺灣區域史研究成果並不多，而且大部分的研究屬於地方文獻類型的地區史性質，受限於行政空間，分論臺東和花蓮兩縣的沿革、族群、歷史事件以及發展，較少將東臺灣視為一個整體的研究空間。東臺灣被視為一個研究的對象，並進行區域研究方法論的討論，事實上是晚近之事。以下配合前述臺灣史研究發展脈絡，分三階段來觀察。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代中葉，是臺灣史研究的空洞期，東臺灣區域史研究也有相同的際遇。本階段東部研究僅有期刊九篇、書一本，研究數量不但很少，且第一位研究東臺灣的歷史學者竟是外國人。一九四九年，日本籍的中村孝志首先為文探討荷蘭時代東臺灣的探金事業。該文亦是此際東臺灣研究之代表作。其次，除了陳榮波探討清代農耕形態之外，主力研究者是《臺東文獻》和《花蓮文獻》的文獻工作者，學院研究則完全空白。研究主題也受到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強調清代統治的正統性而反殖民地統治，因此侷限於零星討論地方開墾、清代治績、沿革、抗日以及史料之譯述。抗日，特別是強調「山胞抗日」的文章有

---

<sup>59</sup> 2001年，潘繼道的新書《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是1992年學位論文之出版。

三篇，佔期刊論文的三分之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或許如何扭轉臺灣原住民聚居最多的花東兩縣的正統史觀，接受新政權，是戰後東部地方文獻的主要任務。

第二階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九年。相對於臺灣史研究正處於論文大量出現的萌芽與發展期，東臺灣區域史的研究數量卻不升反降，僅有論文五篇，<sup>60</sup>碩士論文則有二篇。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因為此階段原來因應戰後縣志編纂需要的地方文獻會遭到裁撤，不再有固定的地方文史發表園地和專門撰稿者，地方史生產因而萎縮。<sup>61</sup>另一方面，在臺灣史研究起步階段，區域史並非重點，位於邊陲的東臺灣更不易立刻受到重視。雖然此際研究成果不多，但是學術性卻大為提高。研究者以歷史學者為主，較集中於日治和清代時期。論文研究主題，除了一篇有關蘭嶼調查史料之外，包括日本人移民、人口移動和農業成長、拓墾開發史以及教會史。其中，一九八五年，鍾淑敏對於日治時期吉野村官營移民的討論，不但是臺灣歷史學者研究東部的第一篇論文，也是國內首度注意到殖民時期日本人官營移民的專論。即使在臺灣史研究脈絡中，這篇論文亦具有開闢新課題之意義。不同時代，各族群移民東部的過程和意義，事實上是東部區域研究中極重要和獨特的課題。然而，目前為止，在平埔族和日本人移民雖小有成果，卻尚相當不足。

其次，張永楨和孟祥瀚等二篇碩士論文，是本階段的重要特色。臺灣區域史研究，通常是以拓墾開發史為先鋒，東部亦不例外。最早的兩篇學位論文，均以開發史為重點，在一九八〇年代臺灣區域史學位論文比重中，東部因此居於翹楚。東部開發史受到注意，應該與清代以來「後山」意象的成立有關。後山的臺東與花蓮兩地不但地理位置獨樹一幟，又在國家權力的介入之下，開發遲緩，更是晚清開山撫番政策之重鎮。因此，在清代臺灣區域開發史中，東臺灣地區變成重點之一，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階段，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一年，臺灣史研究茁壯期。隨著臺灣史研究大環境的改善，地域主義的增強，一九九〇年代之後，東部的

---

<sup>60</sup> 其中史料兩篇，學術性論文兩篇。

<sup>61</sup> 林玉茹，〈地方知識與社會變遷：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臺灣文獻》50(4) (1999年12月)，頁247-250。

歷史學研究終於跨越個位數門檻，期刊論文達四十七篇，碩士論文兩篇，專書六本。其中，扣除文史工作者和非具學術規範論文，期刊論文有二十五篇，書三本，大概仍佔二分一左右。

從時間分佈來看，一九九七年是一九九〇年代東部研究最多的一年，學術性的論文即有十篇。本年度研究的大幅增加，與東臺灣研究所形塑出來的論述空間有相當大的關係。過去東部研究向來以東部人為主，特別是幾篇碩士論文和新議題的發展都是如此。前述地方文獻、鍾淑敏、孟祥瀚之外，一九九二年潘繼道對於平埔族研究、一九九六年陳鴻圖對東部開發研究史的討論，均是東部人研究東部的典型。學位論文更是明顯，東部僅有的四篇碩士論文中，除了張永楨之外，均是東部在地人，或是曾經生活於臺東地區。他們往往基於對故鄉的感情或興趣，著手東部研究。但是，一九九七年，包括陳國棟、張隆志、林玉茹、李文良、陳偉智等則是直接或間接在東臺灣研究所影響下，出現的外地生力軍。由此可見，東部的歷史學研究如同過去的宜蘭研究和高雄研究，仍然需要某些組織、某些力量的推動。或許這是臺灣區域史研究超越僅有在地人或是文史工作者研究格局的方法之一。

就研究斷代和主題而言，本期東部的研究成果，仍以清代時期與日治時期居多，兩者論文數量大概平分秋色。清治時期的研究主題，包括後山的平埔族、清賦、開山撫番、拓墾、經營政策、人物、漢番關係以及勇營等課題。清代開發史所佔比重仍最高，而且有朝向小區域開發史研究之傾向<sup>62</sup>。日治時期研究，包括人口、林野政策、理蕃政策、原住民抗日、東部殖民主義的知識建構、水產業發展、漁業移民等問題。大抵而言，研究的主題較之前兩期，呈現多樣化，雖仍以族群史和開發史為主軸，卻開闢了不少新課題。至於，戰後時期東部研究仍是荒蕪一片，幾無論文可讀。荷蘭時代研究，也只有中村孝志的論文可看。此階段他發表三篇文章，除再度討論探金事業外，首次論及荷蘭統治下東部的地方集會。中村孝志不但是東部荷蘭時代歷史研究之先驅，研究成果亦最受注目。

---

<sup>62</sup> 例如 1997 年安後暉對新鄉（臺東縣池上、關山以及花蓮縣富裏等地）地區開發史的研究。

一九九〇年代的另一特色是通論性區域史專書的出現。彭明輝的《歷史花蓮》即是第一本。該書研究範圍雖受限於行政空間，僅以花蓮作為書寫對象，但因東臺灣地區的學術性歷史學專書偏少，仍具有意義。

一九九〇年代中葉，《臺東縣史》編纂的展開，也吸引不少學科投入東部研究，是此階段之盛事。不過，很可惜的是，歷史學者參與仍相當有限，<sup>63</sup>人類學者是此次縣史編纂的主力，包括卑南、阿美、雅美、布農等各族群史均單獨成書，排灣和魯凱族史則合成一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東臺灣區域研究雖然沒有像竹塹地區和中部岸裡社研究一般，因擁有大批的檔案文獻，而引發研究風潮，吸引其他人文學科投入研究。但是，由於其複雜的族群分佈和地質特色，原來即是人類學和地質學研究的重點之一，<sup>64</sup>深具跨學科取向的區域研究之潛力。一九九七年之後，東臺灣地區的研究，透過東臺灣研究會舉行的幾次研討會，開始出現區域研究方法論的反省。舉例而言，《東臺灣研究》2 所刊載的〈從地中海到東臺灣：兩個歷史空間在方法論上的對話〉等五篇文章，<sup>65</sup>以及該會議的討論最具代表性。這種以跨學科為主在方法論上的探索，卻是目前為止臺灣各區域研究罕見的現象，也與前述一九八七年臺灣歷史學界的討論有所差別。

總之，過去臺灣史研究的遲緩開展，加上研究人力的不足，促使歷史學的東部研究明顯地展現東部人研究東部的格局。外來的歷史研究者，主要是東臺灣研究會成立之後，所營造的東部研究氣氛和舞臺，才開始有進展。該會所導引出的跨學科區域研究方法論的論辯，亦開風氣之先。就研究主題而言，過去的研究傾向於散兵遊勇，沒有累積，也沒有組織，待開發的研究空間仍相當廣大，特別是社會文化史幾乎完全空白。最近，李宜憲、王學新、林玉茹及潘繼道等人，開始以個人為主進行較有計畫、主題式的研究。二〇〇一年，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sup>63</sup> 王世慶和吳文星雖然擔任《臺東縣史》編纂，但實際參與撰稿的歷史學者，僅有孟祥瀚、林玉茹以及李文良，並沒有其他歷史家新加入。

<sup>64</sup> 參見：林玉茹，〈「東臺灣事業」的研究史及其史料評估〉，《東臺灣研究》2（1997年12月），頁17-30。

<sup>65</sup> 這五篇文章作者，分別是夏黎明、林玉茹、陳國棟、林寶安以及張隆志，其中三位是歷史學家。

與東臺灣研究會合辦「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歷史學者提出的研究論文大為增加。<sup>66</sup>由此起點出發，未來東部的歷史學研究成果，應是可以期待的。

## 六、代結語：歷史學與東臺灣的對話

歷史學展開區域史研究，最早的理由是考慮到區域差異和跨學科比較研究之需要，企求更多元和更深入的歷史觀察和解釋。臺灣區域史研究的展開，則較傾向於在地人基於地方認同所展開的地方史研究。即使一九九〇年代盛行一時的方志治史集體研究，仍然不免在後面極力推動的地方政府意志之影響。這幾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越來越多，但也如同前述一九八〇年代區域史研討會所一直反省和討論的，研究區域界定的標準為何？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區域史研究是否最後落入「見樹不見林」的困境？強調跨學科或科技整合的區域研究，究竟帶給歷史研究何種衝擊和啓示？這些問題，或許是從事區域研究必須時時留意和考慮的。

除了方法論的反省之外，歷史學對於區域研究，特別是東臺灣區域研究究竟可以發揮何種貢獻？就我個人近幾年研究經驗所得，大部分全稱性的臺灣史研究都不能檢驗東部。不論從國家或是地域社會的角度，東部邊陲性格極為明顯，自成一套。這種邊陲性格不僅是核心和邊陲相對位置的區隔，而是表現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上各方面的後進性和殊異。歷史學或許可以從歷史變遷，或是內部和外部的結構性因素，

---

<sup>66</sup> 在這次會議中，共提出十四篇論文，其中有八篇論文是歷史學者出身。他們是：張隆志、林素珍、曾華璧、潘繼道、林玉茹、林蘭芳、高淑媛以及鍾淑敏。研究課題集中於產業史和族群史，特別是產業史有四篇。值得注意的是，非東部在地的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首次投入東部研究，乃是此次研討會的新氣象。

來究明東部做爲一個研究區域、整體性歷史空間的正當性，<sup>67</sup>並提供區域研究的基礎背景和對話的根據。

反之，就區域研究對於歷史學之知識建構而言，以東臺灣研究爲例，區域史研究並非僅僅是從臺灣史的架構，讓人瞭解東部，或是僅作區域差異比較。區域史研究應該從更廣的視野，找尋對話的對象。就東臺灣獨特的邊陲性格而言，從國家的邊陲政策、邊陲的處境和反應，及邊陲的發展和變遷等面向出發，甚至與其他區域或是國家進行比較研究，建構「邊陲論述」或許是可行的。進言之，邊陲空間可以成爲一個主體論述的對象，而不僅是被視爲一個地區、一個配角的存

在。即使以個別議題來看，東部區域研究也是饒有趣味的。以移民問題爲例，東部漢人和原住民的二次移民、日治時期日本人移民以及戰後外省兵民的移入等，都是可以再深入突破和比較研究的課題。其次，東臺灣的多族群傾向，從來即是一個重要的現象。這些族群在東部的處境、互動狀況以及社會文化的建立等等，亦是未來值得深入再討論的課題。

## 參考書目

山田賢著，太城祐子譯

1999 〈中國明清時代「地域社會論」研究的現狀與課題〉，《暨南史學》2，頁39-57。

王崧興

1973 〈濁大流域的民族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36期，頁1-10。

王慶成

1999 「序言」，收于朱萌貴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sup>67</sup> 張隆志，〈期待東臺灣研究與年鑑史學的嶄新對話〉，《東臺灣研究》2（1997年12月），頁61、63；夏黎明，〈東臺灣及其生活世界的構成〉，《東臺灣研究》2（1997年12月），頁2。

方豪

1976 〈臺灣史的回顧和展望〉，《史蹟勘考》4期，頁1-1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1986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江村榮一

1969 〈地域史研究小論〉，《神奈川縣史研究》2，頁4-12。

吳密察

1988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課題：訪濱下武志教授〉，《近代中國史通訊》6，頁109-119。

李國祁

1982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李洵、趙毅

1989 〈施堅雅教授中國城市史研究評介〉，收於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頁1-13。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李筱峰

1984 〈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大學歷史所中有關臺灣史研究成果之分析〉，《臺灣風物》34卷2期，頁84-97。

東京大學文學部內史學會編

1983 《1982年の歴史學界回顧と展望》，92編第5號。

1993 《1992年の歴史學界回顧と展望》，102編第5號。

林美容

1997 〈「高雄縣文獻叢書」編纂緣起〉，收於楊碧川，《高雄縣簡史·人物誌》，高雄：高雄縣政府。

林玉茹

1997 〈「東臺灣事業」的研究史及其史料評估〉，《東臺灣研究》2，頁17-30。

1999 〈地方知識與社會變遷：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臺灣文獻》50(4)，頁235-290。

周樑楷

1985 《近代歐洲史學及史學思想》。臺北：華世。

施志汶

- 1994 〈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1983-199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期,頁413-446)。

施添福

-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夏黎明

- 1996 〈發刊辭：一個在地研究構想的提出與實踐〉，《東臺灣研究》創刊號,頁1-7。
- 1997 〈東臺灣及其生活世界的構成〉，《東臺灣研究》2(1997年12月),頁7-16。
- 2001 〈「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側記〉，《東臺灣研究》6,頁213-222。

岸本美緒

- 1999 《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

陳三井

- 1996 〈談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季刊》1卷2期:61-65。

陳文德

- 1983 〈史堅納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人類與文化》18期,頁56-64。

陳其南

- 1991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

張光直

- 1991 〈社會人類學與歷史研究：序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收於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頁1-6。

張炎憲

- 1989 〈清代竹塹地區聚落發展與土地租佃關係〉，《臺灣史研究通訊》13期,頁9。
- 1996 「宜蘭縣史序列序」，收於李壬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宜蘭縣政府。

張秋寶

- 1975 〈中地理論的發展與中國之研究〉，《思與言》13：1，頁 37-45。

張朋園

- 1986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收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頁 849-941。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張隆志

- 1991 《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臺大文史叢刊 87。）  
1997 〈期待臺灣研究與年鑑史學的嶄新對話〉，《東臺灣研究》2 期，頁 51-66。

森正夫

- 1982 〈中國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會の視點〉，《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 28 號，頁 204-205。

溫振華

- 1978 〈施堅雅的中國市鎮研究介紹〉，《教學與研究》3 期（1978 年 9 月），頁 155-184。

賴建誠譯

- 1996 《年鑑學派管窺》。臺北：麥田。

檀上寬

- 1993 〈明清鄉紳論〉，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專論。北京：中華書局。

盧建榮

- 2001 〈滴水測海：豎立由口供治史的新典範〉，收於許明龍譯，埃曼紐·勒華拉杜裏著，《蒙大猶》。臺北：麥田，2001。

濱下武志

- 1990 《近代中國の國際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體制）とアジア（亞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Cohen, Paul A. (柯保安) 著，李榮泰等譯

- 1991 《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臺北：聯經。

Ramon H. Myers (馬若孟) 和 T.A. Metzger (墨子刻) 著，劉紀曜、溫振華譯  
1981 〈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上)(下)，《食貨》  
10 卷 10 期，頁 28-41、10 卷 11 期，頁 37-51。

Skinner, G.W.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 II . III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1964) : 3-43 ; 24 (2) (1965) : 195-228 ;  
24 (3) (1965) : 363-399.

附表一：戰後歷史學的東臺灣研究書目

中文學位論文				
作者	年代	論文題目	學位	
吳建昇	2000	日治以前臺灣後山經營之研究	成大歷史學所碩士論文	
潘繼道	1992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	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孟祥瀚	1988	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張永楨	1986	清代臺灣後山開發之研究	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中文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代	論文題目	期刊	卷期：頁數
溫國良	2001	明治 33 年以前臺東廳之宗教概況	臺東文獻	復刊 6：39-51
邱敏勇	2001	臺灣後山順安城小考	臺灣文獻	51(3)：105-111
潘繼道	2001	日據時期臺灣太魯閣族群的反抗血淚	歷史月刊	164:20-26
潘繼道	2001	清代大莊「舊人」臺灣後山發展史	臺灣風物	51(1):79-109
李宜憲	2001	晚清後山開撫議論之流變	臺灣風物	51(1)：111-140
林玉茹	2001	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	臺灣史研究	7(2):51-93
林玉茹	2000	戰時經濟體制下臺灣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立	臺灣史研究	6(1):59-92
潘繼道	2000	花蓮大莊「舊人」後山移民史	歷史月刊	146：126-132
潘繼道	2000	日據前臺灣太魯閣族群的發展	歷史月刊	152：14-21
李宜憲	2000	晚清後山駐軍與民莊的關聯性	臺灣風物	50(3):83-114
李宜憲	2000	晚清後山駐兵初探	臺灣風物	50(1):13-42
王學新	1999	日治時期東臺灣地區原住民的勞動力	東臺灣研究	4：35-72
吳榮發	1999	從璞石閣到玉裏：一個東臺灣市鎮的早期發展	臺灣文獻	50(3)：263-283
潘繼道	1999	花蓮舊地名探源：認識「加禮宛」	歷史月刊	134：79-85
陳偉智	1998	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	東臺灣研究	3：103-146
潘繼道	1998	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奇萊」民族與其故事	歷史月刊	127：4-11
趙川明	1998	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一八九六至一九六〇	歷史月刊	131：89-95
鍾淑敏	1998	日治時期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71-82

蕭明治	1998	清季臺灣東部的漢「番」關係：以雙方勢力的衝突為例	中興史學 4	175-185
王學新	1998	公文類纂內明治時期臺東地區原住民史料之介紹(上)(下)	臺灣史料研究	10:104-116、11:87-112
吳永華	1997	日治初期臺東植物採集研究史(1895--1904)	臺東文獻	復刊 2：41-54
黃學堂	1997	胡傳與臺東	臺東文獻	復刊 2：109-121
安後暉	1997	清代臺灣新鄉移民拓墾之研究	歷史教育	2：113-146
王學新	1997	論日治初期花蓮地區太魯閣番綏撫策略	臺灣文獻	48(4)：71-98
林玉茹	1997	由魚鱗圖冊看清末後山的清賦事業與地權分配型態	東臺灣研究	2：131-168
林玉茹	1997	「東臺灣世界」的研究史及史料評估	東臺灣研究	2：17-30
孟祥瀚	1997	由-「卑南天後宮置產碑記」論清末臺東社會與經濟的發展	臺東文獻	復刊 1:6-15
孟祥瀚	1997	十七、十八世紀臺灣東部的對外接觸	臺東文獻	復刊 2:3-13
陳國棟	1997	關於東臺灣歷史定性的一些玄想	東臺灣研究	2：31-42
張隆志	1997	期待東臺灣研究與年鑑史學的嶄新對話	東臺灣研究	2：51-66
趙川明	1997	臺東縣寺廟發展簡史	臺東文獻	復刊 1:16-28
張振嶽	1997	西拉雅平埔族的歷史與現況—花,東縣境內的祀壺現象初探	臺東文獻	復刊 1:34-50
李文良	1997	林野整理事業與東臺灣土地所有權之成立型態 1910-1925	東臺灣研究	2:169-195
陳鴻圖	1996	臺灣東部地區開發史研究概況--兼論地方性研究社團所扮演的角色	近代史學會通訊	4：48-56。
張振嶽	1996	噶瑪蘭族打那岸,打朗巷社的遷移—從花蓮潘虎豹家族說起	宜蘭文獻雜誌	21:43-52
王學新	1996	日據初期臺東地區抗日戰事中原住民族群向背之分析(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	臺灣文獻	47(4)：129-148
林玉茹	1996	白川夜舟〈臺東舊紀〉譯註與史料價值評估	東臺灣研究	1：117-140
林玉茹	1993	二二八事件專號：東部地區訪問記錄	口述歷史	4：241-308
中村孝志 撰 許賢瑤 譯	1993	一六五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	臺灣風物	43(1)：155-168
黃學堂	1993	清季對後山之經營及胡傳在臺東的政績	臺灣文獻	44(4):65-96

陳顯忠	1992	臺東天後宮的淵源	史聯雜誌	21:130-133
三田裕次撰 鍾淑敏譯	1992	故陸軍步兵二等卒加藤君墓誌銘-新城事件史料之一	臺灣風物	42(1)：198-200
中村孝志撰 許賢瑤譯	1992 原刊	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	天理臺灣研究會年報 *C	創刊號
林慶元	1992	十九世紀臺灣東部地區的開發	淡江史學	4：141-172
中村孝志撰 許賢瑤譯	1991 原刊	荷蘭人的探金事業再論	天理大學學報 *B	168：187-211
孟祥瀚	1991	清代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	興大歷史學報	1：133-161
孟祥瀚	1991	日據時期臺灣東部人口增加之研究	興大文史學報	21：179-206
陳顯忠	1991	美麗的淨土—臺東簡史	文訊月刊	25：29-32
鍾淑敏	1985	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	史聯雜誌	8
陳彩裕	1983	臺灣戰前人口移動與東部的農業成長	臺銀季刊	34(1)
吳明義	1982	阿美族的曙光—阿美族教會史略	臺灣神學論刊	4：137-162
項秋華	1980	淺談臺東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國教之聲	13(3)：7-12
盛清沂	1979	清代同光之際開山撫番史事編年	臺灣文獻	30(3)：1-26
洪敏麟	1978	光緒二十三年臺東廳吏之蘭嶼探查史料	臺灣文獻	29(1)：1-15
鄭登園	1968	卑南抗日史話	臺灣文獻	19(3)：30-38
陳榮波	1962	清季臺灣東部之農耕型態	臺銀季刊	13(1)：324-344
陳季博編譯	1959	臺東移住民史	臺灣文獻	10(3)：111-116
管容德	1953	日人統治花蓮	花蓮文獻	1：81-88
駱香林	1953	花蓮清時治績考	花蓮文獻	1：3-9
駱香林	1953	山胞抗日紀實	花蓮文獻	1：16-19
駱香林	1953	山胞抗日紀實續	花蓮文獻	2：32-35
曾一平	1953	漢人在奇萊的開墾	花蓮文獻	1
中村孝志許粵華譯	1949 原刊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事業	原刊天理大學學報 *A	1：1

中文專書及其他			
作者	年代	題目	出版地：出版社
潘繼道	2001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	臺北：稻鄉
趙川明	1999	美農高臺地區部落史	臺東：臺東師院
王學新	1998	日據時期東臺灣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及研究	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孟祥瀚	1997	臺東縣史開拓篇	臺東：臺東縣政府
彭明輝	1995	歷史花蓮	花蓮：花蓮洄蘭文教基金會
陳顯忠、林鳳朝	1994	臺東史蹟源流第一輯	臺東：臺東縣政府
林熊祥	1958	蘭嶼入我版圖之沿革--附綠島	臺中：臺灣省文獻會

說明：\*A：1957年6月許粵華翻譯，刊於《臺灣經濟史五集》，臺灣銀行研究叢刊。

\*B：譯稿刊於《臺灣風物》42(3)：85-118。

\*C：譯稿刊於《臺灣風物》42(4)：17-23。

## History and Area Studies: the Case of Eastern Taiwan Studies

Yu-Ju Lin

###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inten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area studies. I by analyzing the area studies-tradition of history, the perspectives of Taiwanese historians on area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in Taiwan, and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of Eastern Taiwan studies.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 me theories or schools of thought that have trended to take an area studies approach to history are the *Annals* school of France, G. William Skinner's scholarship, self-examinations by American Chinese historian during 1970s, and "regional society" theory promoted by Japanese *Minchin* historians. But except *Annals* school, the historians choose area or regional study were basically more concerned with area difference and aspects of society.

Taiwanese historians have consciously advocated area history since the Area Studies Pla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c Sinica, in early 1970. This plan first discussed the methods of area history. Due to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day, studies of Taiwan history appeared as Chinese local history at first, and Taiwan area history studies were few in number.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70s—as the field of Taiwan history was born and began to develop—that Taiwan area history first started. However, most of the scholarship conducted at that time was Sinocentric in nature and concentrated on the settlement of Taiwan during the Ch'ing era. In the 199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l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regionalism, each county in Taiwan began compiling its own local histories. The field of Taiwan history gradually blossomed from then 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Taiwan history was no exception. Before the 1990s, Eastern Taiwan studies simply meant local history studies about eastern Taiwan by people from that area. During the 1990s, the Easter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ETSA)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history of Taitung county was compiled. Eastern Taiwan studies thus developed into a vivid field of enquiry. The pattern of area studies constructed by the ETSA might well provide a methodological breakthrough for area history studies in Taiwan.

**Keyword:** Area Studies History Taiwan History Area History  
Eastern Taiwan Studies Easter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